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编写组

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编写组

主 编 瞿林东

主要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向燕南 江 湄 许殿才

李 勇 汪受宽 张 越

陈其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 / 《中国史学史》编写组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ISBN 978-7-04-050883-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史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5161号

责任编辑 张林 封面设计 王鹏 版式设计 童丹 责任校对 刘娟娟
责任印制 耿轩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7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7.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50883-00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 and 任务	1
二、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史学的发展	3
三、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意义和方法	8
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	10
第一章 先秦时期史学	17
第一节 远古传说、历史意识与历史记载	17
一、远古传说、史诗与历史意识	17
二、史官的出现和历史记载的早期形态	18
三、《尚书》《诗经》和《周易》	21
四、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国史	24
第二节 从学在官府到私人著史	25
一、春秋末年的社会与史学变化	25
二、孔子修《春秋》	27
三、《左传》及其历史编纂特点	29
四、《公羊传》与《穀梁传》	31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多种历史撰述	33
一、《国语》与《战国策》	33
二、《竹书纪年》《世本》与《山海经》	35
第四节 先秦诸子的历史观	37
一、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历史观	37
二、墨子、老子和庄子的历史观	39
三、商鞅、韩非子和邹衍的历史观	40
第二章 秦汉时期史学	43
第一节 大一统政治局面与秦汉史学	43
一、大一统局面与大一统思想	43
二、多元的历史观念	44
三、关于史学的初步认识	47

第二节 奠定史学宏大规模的《史记》	49
一、司马迁与《史记》的撰述旨趣	49
二、“成一家之言”	51
三、“究天人之际”	53
四、“通古今之变”	55
五、有关《史记》的续补	57
第三节 刘向、刘歆的历史文献学成就	58
一、刘向、刘歆父子的史学活动与历史文献学成就	58
二、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	61
第四节 第一部反映大一统历史局面的朝代史《汉书》	63
一、班固与《汉书》	63
二、《汉书》的性质、内容和体例	65
三、《汉书》的博洽	66
四、《汉书》的天人关系论与历史变化观	68
第五节 汉代史学的其他成就	70
一、修史制度与《东观汉记》	70
二、荀悦与《汉纪》	72
三、风俗史与地方史	74
四、重视少数民族史撰述	77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	80
第一节 历史形势的变化促进史学的多途发展	80
一、历史形势的变化	80
二、社会思想的特点与史学社会影响的扩大	83
三、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	87
第二节 多种朝代史撰述的出现	89
一、朝代史撰述的兴盛	89
二、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与范曄《后汉书》	92
三、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三国志注》	98
四、关于北方诸民族政权历史的撰述	101
五、南北朝时期的三部“正史”	105
第三节 地方史、家传、谱牒及其他	111
一、地方史	111
二、家传和谱牒	113

三、佛教史籍·····	116
四、《水经注》与其他方面的历史撰述·····	117
第四章 隋唐时期史学·····	120
第一节 史馆的设立和官修正史的成就·····	120
一、五代史纪传和《五代史志》·····	120
二、重修《晋书》和《南史》《北史》·····	124
三、实录和国史·····	127
第二节 刘知幾与《史通》·····	132
一、史学家批判意识的滋长·····	132
二、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133
三、刘知幾论“史才三长”·····	138
第三节 典制体史书《通典》的旨趣及其史学价值·····	140
一、杜佑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	140
二、典制体通史的开创之作《通典》·····	142
三、杜佑史论的特色·····	145
第四节 历史撰述的多方面成就·····	148
一、《帝王略论》与《贞观政要》·····	148
二、地理书的撰述·····	153
三、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	155
四、民族史撰述的新进展·····	156
五、历史笔记的兴起·····	161
六、《会要》的编撰·····	163
七、佛教史籍的发展·····	164
第五章 五代两宋时期史学·····	167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与史家的历史思考·····	167
一、天人关系的理性认识·····	167
二、“正统论”的兴起·····	170
三、史论与史评的发展·····	172
第二节 撰述前朝史与修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175
一、五代宋初的官修史书·····	175
二、《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177
三、国史纂修及其成就·····	179

四、史学批评的发展与史家修养论的深入·····	181
第三节 编年体史书的代表性著作《资治通鉴》·····	184
一、司马光主修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184
二、《资治通鉴》的“资治”思想·····	185
三、《资治通鉴》的叙事艺术·····	187
四、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189
第四节 纪传体史书的“会通”之作《通志》·····	191
一、通史撰述理论的发展·····	191
二、典制史范围的扩大·····	193
三、郑樵《通志》的史学价值·····	195
第五节 两宋史学的其他成就·····	197
一、本朝史的撰述·····	197
二、吕祖谦和朱熹的史学·····	200
三、民族史观和少数民族史记述·····	202
四、历史笔记、地理书和出使记·····	206
五、金石学与考史之学·····	207
第六章 辽夏金三朝和元时期史学 ·····	211
第一节 辽夏金三朝的史学·····	211
一、辽朝的史学·····	211
二、西夏的史学·····	215
三、金朝的史学·····	219
第二节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元代史学·····	224
一、元朝的修史机构和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224
二、《蒙古秘史》和以蒙古族为主要内容的官修史书·····	227
三、元修宋、辽、金三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	230
四、元代的私人著史·····	233
第三节 马端临《文献通考》对《通典》的拓展·····	234
一、《文献通考》对《通典》的拓展·····	234
二、马端临的历史思想·····	235
第四节 丰富的少数民族史学·····	237
一、藏族史学的成果·····	237
二、《突厥语大词典》与《福乐智慧》的史学价值·····	238
三、南方少数民族的史学·····	239

第七章 明至清中期史学 ·····	242
第一节 明代史学的发展 ·····	242
一、君主专制政治的发展与官修史书·····	242
二、私人著史的繁荣与局限·····	244
三、专史与方志·····	247
四、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	249
第二节 晚明史学的特点 ·····	252
一、王世贞、胡应麟的史学理论成就·····	252
二、李贽历史评论的批判精神·····	254
三、史学的经世之旨与考据之功·····	256
第三节 明清之际史学家的历史批判精神 ·····	259
一、黄宗羲的历史批判·····	259
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学术成就·····	260
三、王夫之史论的理论价值·····	262
四、顾炎武的史学及其影响·····	263
第四节 清代前期史学的繁盛与嬗变 ·····	265
一、以《明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	265
二、史书体裁的新探索与历史文献的整理·····	269
三、三大考史家的成就与崔述史学的疑古思想·····	271
四、少数民族历史撰述的进展·····	275
第五节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	277
一、章学诚撰《文史通义》·····	277
二、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重要成就·····	278
三、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	281
第六节 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及其局限 ·····	283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283
二、中国古代史学的时代局限·····	289
第八章 晚清时期史学 ·····	292
第一节 民族危机刺激下历史演进观念的深入发展 ·····	292
一、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救亡图强史学思潮·····	292
二、龚自珍的批判精神和对公羊学“三世说”的改造·····	294
三、早期维新派的历史变革观·····	297
四、康有为的新“三世说”·····	299

第二节 中西文化撞击下对古代史学面貌的突破·····	301
一、魏源的《海国图志》·····	301
二、《瀛寰志略》《中西纪事》《朔方备乘》·····	304
三、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	308
四、严复《天演论》的传播和史学意义·····	311
第三节 外国史学的输入与中国史学在国外·····	314
一、洋务派人士和西方传教士的外国史译介·····	314
二、维新派人士对外国史学的输入·····	316
三、欧美革命史著的译介与影响·····	318
四、中国史学在国外·····	321
第四节 20 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倡导·····	324
一、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的提出·····	324
二、梁启超前期的史学建树·····	325
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创新价值·····	328
四、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著·····	331
五、近代新史学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	333
第五节 辛亥革命前后史学的新进展·····	334
一、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宣传革命的史论·····	334
二、国粹派史学活动·····	337
第九章 民国时期史学 ·····	339
第一节 史学观念的转变与西方史学的引入·····	339
一、新文化运动与史学观念的转化·····	339
二、各种西方史学观念的引入·····	340
三、新的史学体制的形成·····	343
第二节 新历史考证学的成就·····	345
一、新史料的发现·····	345
二、王国维的古史考证成就及其“二重证据法”·····	346
三、胡适、傅斯年的史学方法论·····	348
四、陈垣、陈寅恪的史学成就·····	351
五、新历史考证学的贡献与局限·····	354
第三节 史学变革中的多种趋向·····	356
一、梁启超后期的史学建树·····	356
二、顾颉刚的“层累”说与古史论战·····	359

三、柳诒徵、吕思勉、钱穆的史学·····	361
第四节 新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史学·····	364
一、少数民族史的田野调查和史料整理·····	364
二、多种少数民族史撰述·····	367
第十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发展·····	370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李达的贡献·····	370
一、唯物史观的传播·····	370
二、李达的史学贡献及其《史学要论》·····	373
三、关于历史学学科体系·····	375
四、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	379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381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社会环境·····	381
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383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384
一、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地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384
二、郭沫若、吕振羽的史学贡献·····	387
三、翦伯赞、侯外庐的史学贡献·····	389
四、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	391
五、邓初民、胡绳的史学贡献·····	392
第四节 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贡献·····	393
一、毛泽东关于史学工作的论述·····	393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断·····	395
第十一章 新中国时期史学的变革、成就和当前发展趋势·····	39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398
一、毛泽东论历史研究与史学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398
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	402
三、关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及其历史意义·····	405
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的新气象·····	410
五、中外史学交流的开展和深入·····	412
六、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与中国史学的继续发展·····	41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新成就·····	418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418

二、关于历史学的理论建设·····	423
三、关于理论、方法论的运用·····	426
四、关于史学遗产·····	428
五、关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430
六、关于史家修养的新境界·····	431
第三节 历史撰述的主要成果·····	436
一、中国通史撰述的成就·····	436
二、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440
三、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446
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	450
五、世界史研究的拓展与学科建设的加强·····	454
六、1949年以后港澳台地区的史学·····	457
第四节 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458
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创新和历史知识的普及·····	458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新型历史文献资料的丰富·····	460
三、继承优秀史学遗产与发扬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	462
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史学发展道路·····	464
阅读文献·····	466
后 记·····	468

绪 论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 and 任务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如自然、社会，自然科学各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中国史学也是如此。所谓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我们知道，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人类创造出来文字以后，就有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有了史学的发展、积累和人们对这种发展、积累的认识与撰述，就有了史学史。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是在变化的、发展的，进而对于这种认识的表述也在变化和发展。在中国古代，尽管人们没有提出“中国史学史”的概念，但关于史学之史与史学史之史的观念早已产生。^①

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经过九十多年的历程，已初步确立起来并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24 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史学史”这一观点^②，但他并未就此展开论说。1925 年至 1927 年，梁启超作“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学术讲演，明确而详细地论述了“史学史的做法”^③，开辟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道路。

在弄清楚史学同史学史的关系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关于中国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演变的规律。当然，这是一个广义的研究对象，而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对于其中的某一个段落、某一个专题，甚至某一个史家、某一部史书的研究，也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专史来说，研究者的长远目标，还是应当走向广义的研究，或者说贯通的研究。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掌握一个一个的局部，是把握研究对象之整体面貌的基础；反之，把握了研究对象之整体面貌，才可能对其中一个一个局部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准确的定位。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我们应当这样看待。

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或者说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的认识，随着研究

① 参见《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②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 1996 年版，第 70 页。

③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151—168 页。

的深入而有所发展。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他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①史官同史学的产生有密切关系,同史学产生以后的官修史书也有密切关系。史家的出现,同私人撰史相联系。在中国史学史上,官修史书同私人撰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需要注意的是,史官可以看作最早的史家,而许多史家却并不具有史官的身份。“史学的成立及发展”,这是着重于对中国史学全貌作出概括并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相关研究,梁启超特指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最近史学的趋势”,是表明史家对其所处时代之史学状态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明确史学未来的走向。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应当说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30年代末,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书稿,就是依据梁启超所提出的上述研究范围完成的,1944年此书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1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史学工作者,开展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②推动了对有关问题的深入认识。1986年,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1册《叙篇》中,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作了这样的表述:

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③

这个表述所包含的学术视野和思想内涵,比之于梁启超所说的四项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升。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了探索规律,二是强调了史学的时代特点,三是强调了各种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

综合近几十年来的有关研究所得,我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可以作比较具体的认识和表述,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

^①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3页。

^② 参见瞿林东编:《中国史学史研究·导言》(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③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又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

的阶段性的特点，包括史学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史学自身的阶段性的特点；各种有代表性的史学成果的特色及其社会影响；史学与社会的作用；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领域的关系；史学家之历史认识（历史理论）的发展；史学家之史学认识（史学理论）的发展；

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与史学内容的逐渐丰富的一致性，不同的历史观点、史学观点的矛盾、辩证促进着史学的进步，求真与致用的辩证统一，史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在历史进步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等。^①

如前所述，这一研究范围是很恢廓的，有很大的空间。研究者只能从局部研究做起，逐步走向整体研究。

在明确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概括：第一，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总结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优良传统，作为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借鉴和滋养，同时彰显其在世界史学中的重要地位。第二，认识史学同社会的辩证关系，即一定时代的史学成果，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时代的产物，既蕴含着历史的传统又彰显出时代的特点，而不同的史学成果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又反过来影响当时与后世，使人们从阅读史书中借鉴历史经验、丰富历史智慧而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进而使史学在社会中处于它应有的重要位置。实现这两个任务，是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史学的发展

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程度时的产物，这是因为：第一，历史记载必须借助于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第二，历史记载还必须有纪年的发明和使用；第三，历史记载也需要明确的地理观念和地名的产生。在这些条件还没有被人们创造出来以前，先民的历史记忆是依赖于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其中包含着先民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劳动中获得成功的故事，包含着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故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古朴的传说成分，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保留着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的踪影。

远古传说同历史记载的关系是：远古的传说，可以看作文字发明以前，先民口耳相传的原始的“口述史”，是先民原始历史意识的反映。当文字被发明出来后，这种原始的“口述史”被人们整理、记述下来，并写入诗歌和官文书之中，

^①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绪论》一文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即：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官制度，史学家的生平及其成就等。（参见杨翼骧：《学忍堂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0—414页）

于是前者成了半是诗歌、半是历史的作品，后人谓之“史诗”，如《诗经》中的《雅》《颂》某些篇章；而后者则成了半是历史、半是现实的作品，如《尚书》中的有关篇章。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式的史书出现了，这种原始的“口述史”中的某些片段，往往在史书中为史家所述的历史人物所称引，并以此或追怀过往，或解释现实，成为说明、反映他们对某种事物见解的例证和根据，这在《左传》《国语》等书中常可见到；但此类原始的“口述史”并不是这种正式史书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史学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通史书出现了，这样一来，有些原始的“口述史”便被史家作为历史的源头写入通史，从而成为通史著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上，大抵是远古传说在文字出现后，同史学之间关系演变的轨迹。这个轨迹，或许正是远古传说在史学产生、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几个阶段或几个层面及一般规律。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字出现以后，远古传说成为激发一些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活力之一，甚至成为他们构建自身的历史观的重要素材；同时，远古传说也成为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活动的题材和灵感。当然，这已超出了史学的范围了。

中国在商朝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后人因其刻于龟甲兽骨之上，故名。因其是有关占卜的记载，又称为卜辞。据郭沫若的研究，甲骨文已是一种发展比较成熟的文字，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商朝的甲骨文当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中国文字应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①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为寻求中国文字的萌芽形态进行着艰苦的努力。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因铸或刻在青铜器上，故后人称之为金文，又因其与钟鼎一类礼器相联系亦称钟鼎文，由这些文字所组成的记载被称作彝铭。金文是稍晚于甲骨文的文字，彝铭是稍晚于卜辞的历史记载。目前所知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中一些篇章和《诗经》中《雅》《颂》反映的古老史诗，也是较早的历史记载。

商周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从发展走向鼎盛的阶段，故甲骨文、金文等所记内容都与奴隶主贵族和王室有关。从东周建立到春秋末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前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大国争霸，成为时代的特点。从民族关系上看，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中原诸华及诸夏的关系出现了密切交往的趋势。从史学上看，这个时期，在周王室和一些诸侯国出现了“国史”，这是从前一阶段自觉的历史记载发展到自觉的历史撰述的阶段了，是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的表现。国史的出现，表明至晚在西周末年已经有了准确的历史纪年；从孔子据鲁国国史而修成的《春秋》的表现形式来看，当时的国史很有可能是按年代记事的编年体史书。而孔子修《春秋》突破了史学为官府所垄断的格局，开创了

^① 参见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私人撰史的路径，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后来，人们即将《春秋》一书所包含的年代称为春秋时期。孔子还整理商周的官文书《尚书》和诗歌总集《诗经》等文献，也具有重大意义。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后期，伴随着社会改革的进展，各大诸侯之间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东周王室名存实亡。这时期，私人历史撰述获得重大发展。其中《左传》《国语》写出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复杂局面和各族在冲突、交往中走向融合的趋势；《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不仅写出了恢宏的历史场面，也写出了士人、游说之士在政治与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反映了历史撰述中人物的社会角色不断下移的倾向。这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通史撰述《世本》，以及《竹书纪年》《山海经》等。

至此，中国史学走过了从兴起到初步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在历史上经历了从重视神的作用到重视人的作用的转变，人们对史学的功能有了初步的认识，而多种史书的社会表现形式，以及“书法无隐”的精神和“君举必书”的原则受到后人的赞扬和遵循，成为优良的史学传统的一部分。

秦的统一，标志着封建制的社会形态在全国的确立，而秦汉时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秦朝的“焚书坑儒”政策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却在客观上为产生盛大规模的历史著作提供了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条件。西汉时，司马迁著《史记》，贯通古今，规模宏大，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中国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东汉班固著《汉书》，为此后中国历代皇朝撰修“正史”树立了楷模；荀悦据《汉书》而作编年体皇朝史《汉纪》，是《左传》以后编年体史书的新发展。这几部书是中国史学成长时期的代表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原先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地主被门阀地主取代，后者的家族影响远胜于前者，故门阀意识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前一时期世家大族势力的膨胀成为政治上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继之以门阀地主阶层走向政治的中心舞台，加之民族的大规模迁移和组合，这一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的复杂局面。这一局面历经370年至隋朝的统一才告结束。与此相适应的是：这个时期的史学出现了撰写朝代史的盛况；有关北方民族史的著作也很多；地方史、人物传、家传、谱牒受到普遍的关注，这多与门阀风气相关联；佛教史著作、中外交通史著作以及史注之书等，都有新的创制与新的发展。总之，这是一个史学多途发展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虽产生于政治上分裂时期，但大多反映出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和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隋唐时期，门阀地主仍然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它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延续。但是，由于统一政治局面的重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科举制

度的产生、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势力的发展，门阀地主逐渐走向末路。隋唐皇朝是继秦汉皇朝以后，再次出现的两个蝉联的统一皇朝，在盛大的“天下一家”的政治统一局面下，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新的发展。在史学方面，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认识到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正式设立史馆，聚集史官修撰前朝史与国史，以宰相负责监修。中国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正史产生于盛唐时期，而史馆制度则一直延续到清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史书的种类和数量大量增加，而史馆的修史活动也暴露出史书编纂方面的一些问题，从而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刘知幾的《史通》是一部划时代的、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影响后世直至于今。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打断了盛唐发展的势头，唐朝由此走向衰落，这种情况促使史家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杜佑的制度史巨制《通典》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问世，奠定了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坚实基础。隋唐时期出现了几部规模宏大的全国地理总志，有的流传至今，它们反映了盛大皇朝的地理面貌。地方史、民族史、传记、谱牒、家传等著作，都有新的发展。还有一个新的史学现象是历史笔记的兴起和笔记作者具有鲜明的“补国史”的意识，表明史学受到更多士人的关注。

唐朝灭亡后，当时的中国又一次经历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命运：先是有五代十国的更迭与割据，继而有北宋与辽、西夏的和战，接着南宋与金的和战，最后由元结束分裂局面，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总的来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品官地主一般不具有家族势力的影响，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这时期的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民族间的冲突和交往、各个政治实体间的战争与议和，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荡，但这种动荡并未阻断固有的大一统观念和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因此元朝最终结束了分裂局面，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历史规律与政治逻辑相一致的体现。这时期的史学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方面也有新的提升，同时还有新的史书体裁的创造。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部体裁不同的通史著作，把中国古代的通史撰述推向高峰。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撰述主旨，郑樵对“会通”思想的阐述及其在《通志·二十略》方面的创造，马端临关于“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的史学批评原则以及他对于“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的深刻见解等，反映了他们各自的通识。对唐代兴亡之故的探讨是宋代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孙甫的《唐史论断》、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范祖禹的《唐鉴》，都提出了在这方面的思考。

宋朝史家重视本朝史撰述，显示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时代精神。《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开创了又一种史书体裁，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元末所修宋、辽、金三史，把中国古代多民族史学深入发展的成果推上庄严的史学殿堂。

明清时期（1840年前）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官绅地主代替品官地主，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走向巅峰，民族关系在冲突、交往中走向新的稳定，中国古代疆域确定，是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在史学上，明代中晚期的王圻、李贽、王世贞、谈迁等，在文献与史料整理、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本朝史撰述等方面各有成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把历史批判精神和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在地理书、农政与救荒著作、学术史著作和历史评论著作方面，作出了开创性或总结性的贡献，是这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乾嘉时期的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历史考证成就和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以及稍晚一点的阮元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是这时期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方志和笔记撰述的增多，历史教育在贵族阶层和下层民众间都有进一步的展开，也是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

清代后期（1840—1911），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救亡图存的思潮勃然兴起，维新失败则继之以革命，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存在两千一百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民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清代后期的七十年中，中国史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古老的历史演进思想被赋予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进而发展为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思潮，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是传播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在撰述上多关注于边疆史地、外国史地和中外关系，以及欧美革命史著作的引入，是这个时期史学的新内容；以新的历史观点编写新式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成为时代要求的反映。中国史学由此跨入了它发展史上的近代前期。

民国时期（1912—1949）史学的近代性质更加突出，我们也把它称作中国近代后期史学。这时期史学最突出的变化是历史观念的变化，其特点是：在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外史学交流更加频繁、更加广泛，外国的尤其是西方的各种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纷纷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历史观也在中国传播。历史观念的变化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革，运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历史和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待历史成为这时期中国史学的主流。“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涌现出一批知名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尤其是少数民族史学家群体的形成和相关论著的出版，意义重大。随着近代教育和近代学术的发展，历史教学、历史研究的机构纷纷建立起来，历

史学的人才不断增多，历史学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需要强调的是，民国时期，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仍是时代的主题，人民解放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在这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纪元。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迈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充满信心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在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民族史、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外国史与世界史研究也有重大进展；中外史学交流趋于频繁，中国史学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日益彰显中国史学固有的民族特色。

中国史学目前面临的任务和主要趋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积极面对时代提出的历史使命，史学工作者发挥自身的学识和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与时代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并作深入的探索和阐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社会化的多方面努力，使正确的历史知识成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精神食粮。史学工作者要培养起博大胸襟，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一方面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优良传统；一方面虚怀若谷，了解和吸收外国同行的有益研究成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了这种世界眼光，才能把我们自身的中国特点、风格和气派看得更加真切，发挥得更加出色。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和完善中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三、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意义

史学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历史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演进规律的科学。2015年8月，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济南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大会发去贺信，信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

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①

这是对太史公司马迁两句名言的阐释，也是对当今历史研究之意义所在和历史学之特殊重要性的概括。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是要深入认识历史研究的意义和历史学的重要性，为促进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努力。这里既有认识上的逻辑联系，也有史学的社会功能的价值诉求。

首先，学习中国史学史是认识中国历史学进而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指出：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历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史官不绝，竹帛长存”^②，意即一代又一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流传下来，人们通过阅读这些历史著作而认识到久远的过往，认识到历史上的人和事及其是非善恶。因此，刘知幾感慨地写道：“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③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可以认为，在一千三百年前，刘知幾已经明确地阐明了历史学的重大社会价值，即人们通过历史学这个“窗口”，可以“看见”历史，进而从历史中汲取知识、启示、经验、教训、智慧和精神。环顾今日之世界，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不论是总结历史经验，还是洞察历史教训，对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学习中国史学史可以系统地认识中国历史学的特点，进而认识中华文明的特点。中国史学史表明，从现今所知的传世文献来看，中国史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发展从未中断，并积累了浩瀚的文献和众多的历史名著。中国史学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在全世界罕与其匹。这样宏伟的史学，既是中华文明的产物，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忠实记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丰富性和民族特点，都可以从中国史学中得到有力和深刻的阐明。

第三，学习中国史学史可以认识、传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为创造当今史学的新成就提供借鉴和养料。如以撰写信史为最高追求目标的传统，重视修史的传统，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经世致用的传统，讲求体裁、体例和叙事的传统，关注史家自身修养的传统等，都值得当今的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继承和发扬，以便更好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学习中国史学史有益于史学工作者提升治史理念、改进和丰富治史方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名家辈出，其治史理念与治史方法，都是宝贵的史学遗产。如司马迁的通变，班固的博洽，陈寿的叙事，范晔的史论，刘知幾倡导的自得之

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②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③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